

Research on innovative models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disposal in post-epidemic era

Xiaofei Huang

Meishan Branch, Sichuan Bank Co., Ltd., Meishan, Sichuan, 62001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the uneven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domestic structural adjustments have accelerated the emergence of non-performing assets (NPA) risks in the banking sector. Traditional approaches such as bulk transfers, debt restructuring, and judicial auction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efficiency and cost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rends in bank NPA disposal based o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nd asset restructuring theories, while exploring innovative pathways through fintech,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igital risk control, data-driven pricing, and platform-based circulation are key to improving disposal efficiency.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system integrating technology, legal frameworks, and capital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recovery rates and asset reuse level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policy support systems,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of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MC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tiered NPA markets.

Keywords

non-performing assets; post-pandemic era; asset securitization; fintech; risk management

后疫情时代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创新模式研究

黄小飞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中国·四川眉山 620010

摘要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不均与国内结构调整叠加，银行业不良资产风险加速显性化。传统的批量转让、债务重组和司法拍卖等方式已难以满足效率与成本要求。本文基于金融风险管理与资产重组理论，分析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结构变化与趋势，探讨金融科技、资产证券化与市场化机制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风控、数据定价与平台化流转是提升处置效率的关键，构建“科技+法务+资本”协同体系可有效提高回收率与资产再利用水平。为实现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需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AMC职能并推动多层次不良资产市场建设。

关键词

不良资产；后疫情时代；资产证券化；金融科技；风险管理

1 引言

疫情对全球经济格局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银行业作为金融稳定的核心部门，其资产结构和风险暴露水平在疫情冲击下发生显著变化。受供应链断裂、消费需求萎缩、企业现金流紧张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贷款违约率上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承压。与此同时，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与信贷扩张使潜在信用风险进一步累积，催生不良资产规模的新增长。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以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依赖债务重组、资产转让和司法拍卖等路径。然而在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发展迅速的背景下，这些手段暴露出效率低、周期长、流动性差等问题，难以应对后疫情时代复杂的风险

结构。银行迫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优化构建新的处置体系，实现从“被动化解”向“主动管理”的转变。本文旨在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后疫情时代不良资产的生成特征、风险传导机制及创新处置路径，探索金融科技赋能下的不良资产管理新模式，为银行业高质量转型提供参考。

2 后疫情时代银行不良资产的结构特征

2.1 宏观经济调整与资产质量恶化的关联

疫情对产业链稳定性与企业现金流造成长期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因资金断裂而失去偿债能力，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阶段性上升。国际经验表明，经济恢复期银行资产质量往往呈“滞后恶化”特征，即经济指标回升但企业偿债能力尚未同步改善。我国2020—2023年间不良贷款率虽总体稳定在1.7%至1.8%区间，但潜在风险资产比例上升，贷款迁徙率持续攀升。特别是在房地产、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周期

【作者简介】黄小飞（1984—），男，中国四川江安人，本科，中级经济师，从事金融研究。

性行业，贷款集中度高、抵押品贬值快，形成结构性风险积聚。

2.2 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与区域不均衡性

疫情对地方经济冲击较大，区域性银行资产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弱，不良资产问题更为突出。中小银行在信贷结构上倾向支持中小企业和地方基建项目，其抵押品主要为土地和厂房，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此外，由于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相对薄弱，部分中小银行存在贷后管理不严、拨备覆盖率不足等问题，加剧了不良资产形成速度与积压程度。区域间政策执行和市场流动性差异，也使得不良资产的清收和处置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

2.3 隐性不良资产的累积与表外风险显性化

疫情期间，为支持企业稳产复工，银行通过贷款展期、延期还本付息等方式缓解短期风险，但部分债务实质上已丧失偿还能力，形成“隐性不良”。同时，影子银行、理财子公司及非标资产业务的风险在市场波动中被重新暴露，表外资产风险逐步回流表内，增加了银行整体资产质量压力。随着监管趋严，银行需对潜在风险进行提前识别与计提，推动资产质量“真实化”评估。

3 传统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局限性分析

3.1 批量转让与资产管理公司（AMC）的效率瓶颈

自1999年中国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来，批量收购与集中处置成为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传统AMC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多重效率瓶颈。其一，资产收购与转让环节存在估值偏低和价格失真问题。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与评估体系不完善，AMC往往难以准确评估资产真实价值，导致转让价格偏低，削弱了银行资产回收率。其二，处置周期普遍较长。AMC内部决策流程复杂、资产结构多样化，加之法律诉讼与重组谈判周期过长，资金周转率低，造成资产价值进一步贬损。其三，AMC资本实力有限，过度依赖政策性资金与监管豁免，市场化运营能力不足，难以形成良性盈利模式。随着不良资产市场规模的扩大，传统AMC以“收购—清收—转让”为核心的单一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期风险化解需求，亟须通过科技赋能与资本融合实现模式重构与效率提升。

3.2 债务重组模式的操作复杂性

债务重组作为不良资产化解的重要手段，能够通过调整债务结构、延期偿还或债转股方式恢复企业经营活力，进而提升资产回收率。然而，该模式在执行中面临操作复杂、风险多发等问题。债权人之间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协调难度大，常导致重组进度延迟或方案流产。司法程序的冗长与行政审批环节的繁复，使重组成本高昂，实施周期延长。部分企业在重组后因产业结构落后、市场需求不足或管理能力缺陷，再度陷入违约风险，形成“重组后再不良”的循环。银行在重组后缺乏有效的信用追踪与绩效评估机制，难以及时

识别潜在风险。

3.3 司法处置与抵押物变现的障碍

司法拍卖是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实践中仍存在制度与市场双重障碍。拍卖程序冗长、环节繁多，使资产变现周期过长，导致抵押物价值缩水。评估环节普遍存在主观性强、缺乏标准化的问题，评估价偏离市场真实水平，造成流拍率高与资源浪费。尽管“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在信息公开与参与便利性上取得进展，但仍面临竞买率低、执行效率不足等现实挑战。部分抵押物如厂房、土地使用权及特定设备流动性差，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债权确认与担保追偿程序复杂，法院执行周期长，也延缓了资金回收进度。此外，不同地区司法实践标准不一，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增加了跨区域处置成本。

4 不良资产处置的创新路径分析

4.1 金融科技赋能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后疫情时代，金融科技的深度融合为银行不良资产管理注入了创新动力。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使资产交易全过程可追溯、不可篡改，显著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与信任基础。人工智能算法可对债务人信用状况、资产抵押物价值及偿还能力进行动态建模与预测，帮助银行精准识别高风险客户群体。建立以“不良资产数据中台”为核心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整合贷款合同、抵押物评估、司法执行及市场价格数据，实现不良资产的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监管。银行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处置案例，提取最优清收路径与回收策略，从而实现智能决策与风险预警^[1]。

4.2 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融资工具创新

资产证券化（ABS）是解决不良资产流动性难题的重要金融工具。通过将不良贷款打包为可交易证券并分层发行，银行能够实现风险转移、资本回收与表内资产优化。NPL（不良贷款）ABS市场的不断成熟，标志着不良资产处置由行政主导向市场机制转变。然而，该市场仍面临定价机制不透明、投资者参与度不足与信用评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未来可探索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相结合的混合结构，将不良资产中具有持续收益能力的优质物业转化为现金流资产，实现“资产重组—收益再生”的可持续循环。同时，结构化融资工具如债转股基金、联合处置基金与混合所有制AMC平台，能够在资本市场引入多方投资主体，实现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通过金融创新与制度保障相结合，资产证券化可成为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核心引擎。

4.3 市场化处置平台与二级交易体系建设

构建全国统一的不良资产市场化交易平台是提升处置效率与信息透明度的关键。通过整合政策性AMC、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及商业银行的数据资源，可实现资产挂牌、竞价与撮合交易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二级市场的建立可为不良资产提供持续流动性，吸引私募基金

金、保险资金及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形成多层次资本介入的市场格局。平台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法律顾问与风险控制服务,确保资产定价公允与交易合规。借助人工智能分析与大数据建模技术,可实现资产价值动态评估与市场价格自动匹配,从而提高交易效率与价格发现功能。通过构建“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二级交易体系,能够推动不良资产从单一金融问题转化为可交易的资本资源,形成政策、技术与市场协同的良性生态,为金融体系风险化解提供长期支撑^[2]。

5 综合治理与制度保障体系优化

5.1 政策支持与法律制度完善

后疫情时代不良资产规模持续上升,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处置效率。《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条例》的完善是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基础,应在法律层面明确信贷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担保追偿及资产证券化等关键环节的权责关系,减少操作歧义和法律风险。应建立司法确认快速通道,缩短处置周期,防止资产价值在长期司法程序中贬损。政府层面可出台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及不良资产处置专项基金等支持政策,增强金融机构资产减值处置动力。监管部门应加强财政、司法与金融系统的协同监管,形成跨部门联动机制。通过统一的政策框架与执行标准,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障信息透明与权责可追溯性。对地方性金融机构,应建立分级授权和绩效考核制度,确保政策落地效果,实现制度供给与市场活力的有机结合^[3]。

5.2 AMC 机构职能拓展与市场化改革

资产管理公司(AMC)作为不良资产化解的核心力量,需完成从“被动接收者”向“主动运营者”的职能转型。传统的收购处置模式局限于风险清理阶段,缺乏资产重组与再造能力。未来,AMC 应建立“AMC+投行+科技”的复合化模式,融合投融资、咨询与数字管理功能。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实现资产评估、交易与回收过程的智能化与可追溯化。AMC 还应拓展债转股、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及资产托管等业务,实现不良资产价值再生与收益延展。地方 AMC 应在监管引导下加强区域协同,形成信息共享与联合处置机制,防止恶性竞争和重复收购。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双轮驱动,逐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化 AMC 体系,提升全行业

资产运营效率^[4]。

5.3 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体系建设

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直接决定不良资产处置的流动性与价格发现效率。为提高不良资产的市场化转化率,应完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收益权转让、债转股基金等多层次金融工具体系。推动商业银行、AMC、私募基金及保险资金共同参与不良资产投资,通过结构化设计实现风险分层与收益共享。应建立全国性不良资产交易所,统一挂牌、竞价与撮合标准,增强透明度与公信力。同时,鼓励设立绿色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节能减排、生态修复等项目,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回报并重。对于特殊行业的不良资产,如房地产与制造业,应构建差异化融资与处置机制,结合 REITs、并购基金等工具推动资产重组与再利用。通过资本市场的深度参与,不仅能缓解银行资产压力,也能促进存量资产优化配置,形成“政策支持—市场流转—价值再造”的可持续闭环^[5]。

6 结语

后疫情时代,银行不良资产管理已进入数字化与市场化并重的新阶段。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行业结构性风险,传统的被动清收模式已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金融环境。创新处置模式的核心在于技术赋能、制度完善与市场协同。通过构建数据驱动的不良资产管理体系,推动资产证券化与平台化交易,建立法律保障与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可在降低处置成本的同时提高回收率与流动性。未来,不良资产处置将更加依赖智能决策与跨部门协同,形成“科技引领、市场主导、监管协同”的新格局,为我国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参考文献

- [1] 陈旭勇.完善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五大建议[J].中国商界,2023,(10):74-76.
- [2] 李子卓.后疫情时代不良资产价值评估模型研究[D].云南大学,2021.
- [3] 王瑜.后疫情时代下不良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
- [4] 王彬.后疫情时代不良资产行业走向与破局之道[J].中国银行业,2022,(07):79-81.
- [5] 杨程.Z银行湖北分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优化策略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3.